

國史館的現在與未來

林滿紅*

國史館1947年成立於南京，1958年在臺灣復館，其任務原為中華民國歷史資料的蒐集、整理、研究及歷史的寫作與出版，清史研究雖有，但非主力。而我的研究，無論是臺灣史或中國史，都由清代研究起，臺灣史部分雖也延展到日本統治時期，向下延伸到中華民國統治時期則是較近期的事，因此我與國史館的往來並不算多。1995年與哈佛大學前文理學院院長柯偉



●林滿紅館長

林（William C. Kirby）合作調查「中華民國經濟檔案」，首度接觸國史館。深深感到以國史館為首的國內檔案豐富到可以發起「全民寫史運動」。我在這個檔案調查計畫完成之後，先後指導學生利用國史館及其他機構的檔案撰寫學位論文，這些學生大多只是大學畢業，而且多半在沒有政府經費補助的情況下，仍可提出相當不錯的研究。近年來國史館與其他機構積極地大量展開檔案數位化的工作，讓我更

* 國史館館長

深刻感到如果不將這些龐大的政府投資化為研究成果，將會構成很大的浪費。近幾年國家也興設許多博物館，但其中一些缺乏檔案研究配合的展出，常難以令人產生共鳴和感動。在這些想法的驅使下，我毅然接下了國史館館長的任命。

在接下這個任命之後，才發現國史館的法定任務目前還包括我自己的一個研究領域——臺灣史，除了本館之外，還要督導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另外，由於國史館是「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相關業務的主管機關，遂使其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一樣都兼具博物館的職掌。國史館的內部規章也要求館內研究人員要規劃博物館的展示主題。拙著《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麥田出版社，2002年）收入我在1995年發表的〈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一文。



●新舊任館長交接，左為張前館長炎憲、中為蕭副總統萬長、右為林館長滿紅（2008年5月20日）
（黃秀妃 攝）

此文指出當前臺灣社會很多問題，相當程度是來自歷史學與社會的嚴重脫節。現在政府要我肩負將歷史學與社會緊密結合的重責大任，這對我本人而言，絕對是一大挑戰。

在接任這個工作之前不久，2006年才將拙著《中國之逆轉——世界銀荒與嘉道咸秩序》（英文書名：*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交由哈佛大學出版。這本書試著回答的問題之一是：何以今文經學在西漢由盛行轉為沈寂之後約有1600年，卻在鴉片戰爭前後龔自珍與魏源的時代突然成為全國性的顯學？在這部分的討論中，我必須釐清今古文經學的分際，其中觸及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古文經學者視孔子為史料編纂者，對於當代不起任何的引領作用，對於帝王的絕對權威也不構成任何威脅。今文經學者認為孔子是穿著老百姓衣服的「素王」，作《春秋》這部國史，旨在對當代有所教化，「道統」是相對「政統」的一股制衡力量。除此之外，今文經學也強調「天」的重要性，「道統」、「天」與「政統」，共同構成多元權威。《中國之逆轉》一書，除了討論19世紀上半葉的世界銀荒導致深刻依賴世界銀供的中國政府失控，並使其無法固守擁護絕對權威的思想之外，也由19世紀下半葉的白銀回流及內憂外患的不斷發生，說明擁護絕對權威思想的再興，及其對往後中國的深刻影響。

來到國史館，我發現即使有些同仁也依法定職掌從事國史的研究與寫作，但仍有很多同仁是將國史館的任務等同於史料編纂。而整個館的領導工作，也有相當程度是環繞著絕對權威在運作。今後我將試著使同仁的史料編纂盡量與歷史書寫結合，也希望整個館改以環繞多元權威而運作。在另一方面，孔子作《春秋》，既強調夷夏之防，也重視人物褒貶；中國近代的國史書寫，也相當強調民族主義及人物品評。在國史館也看到若干這類

的發展。因為自己的研究向來發現本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相互激盪的一面極為重要，而臧否人物並不如從事一些有長遠影響的現象分析或探討一些事物的古今流變，富有意義。往後帶領國史館，也會朝後面的方向多所著力。以往的國史常環繞著帝王書寫，今天帶領國史館，雖然要負責總統與副總統的文物展示，但也會嘗試探討國家領袖與國際社會及國內社會相互影響的一面。由於國家的定義除了領土、政府、主權之外，另有極為重要的人民。人民的歷史也將成為往後國史館所寫歷史的重要部分。

在引領國史館工作由史料編纂往整體歷史書寫發展，進而支援博物館展示的過程中，與國內外學者的合作與交流，乃至動員全民寫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國史館直屬總統府，在國家歷史的書寫及相關的博物館展示工作上，希望能恪守國家所賦予的領導責任，不負所託。（寫於2008年5月20日就職之後的一個月）